

# 新中国 70 年的民生发展研究

黄燕芬 张志开 杨宜勇

**【摘要】**文章将新中国 70 年的民生发展划分为站起来(1949~1977 年)、富起来(1978~2011 年)和强起来(2012~2019 年)3 个重要历史时期,按照“7 个有所”的基本框架分析新中国 70 年民生领域的发展变化,得出以下结论:(1)“7 个有所”的进展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2)“7 个有所”之间参差不齐,发展不平衡。(3)70 年民生大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得到强化。(4)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主体多元化,是促进 70 年民生建设大发展的重要推力。未来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拓展“7 个有所”的范围,解决“7 个有所”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并继续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关键词】**新中国 民生 发展 保障 基本公共服务

**【作者】**黄燕芬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志开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杨宜勇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新中国 70 年来,民生问题不仅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虽然现有与民生相关的研究覆盖面广,但对单一民生问题(如就业、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研究较多,聚焦民生整体发展的文献较少,尤其是缺少从历史视阈全方位梳理和总结新中国民生发展特征的研究。那么,在新中国 70 年的历史演进中民生发展分成几个阶段?民生发展具有怎样的变动轨迹?民生发展整体水平、子领域、结构与分布有哪些特征?本文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7 个领域梳理新中国 70 年民生发展的基本脉络。

## 一、70 年民生发展的 3 个历史阶段

回顾新中国 70 年的发展,在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1949~1977 年)、富起来(1978~2011 年)到强起来(2012~2019 年)的三次历史性飞跃的同时,民生工作和民生发展也由此上了三大台阶(杨宜勇等,2019)。

### (一) 站起来时期(1949~1977 年)的民生发展

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同志发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庄严宣告,当年通

过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提出“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而奋斗”的目标。在站起来时期(1949~1977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实施了计划经济,初步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发展和巩固了农村集体经济,奠定了解决民生问题坚实的经济基础(毛泽东,1991)。总之,在新中国站起来的历史时期,民生发展强调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确保百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安居乐业、物质生活有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初步覆盖。

### (二) 富起来时期(1978~2011年)的民生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新阶段,民生发展进入富起来时期(1978~2011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着力摆脱整体贫困、改善人民生活,逐步实现先富带后富(邓小平,1993)。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着眼于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致力于解决生活温饱和迈向总体小康,顺利实现千年目标,完成了改善民生的历史性任务(江泽民,2006)。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着力于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刷新小康社会建设目标,主动赋予民生发展更高的要求(胡锦涛,2016)。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确定基本民生由“5个有所”构成,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总之,在新中国富起来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民生发展致力于普遍富裕,特别强调先富带后富,通过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实现充分就业、收入提高、住房宽敞和基本公共服务不断增项。

### (三) 强起来时期(2012~2019年)的民生发展

在强起来时期(2012~2019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民生改善的前进方向。2015年,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把“5个有所”拓宽成“7个有所”,增加了“幼有所育”“弱有所扶”。在强起来时期,全国的民生发展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强调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就业和收入分配更加公平、基本公共服务提质增效、百姓的满意度不断增强(习近平,2014、2017a、2017b)。

如果用一个指标反映新中国70年民生发展进程的话,那么最好的指标莫过于恩格尔系数。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发展阶段划分标准是: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1949年前,旧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80%和90%,总体恩格尔系数高达88%,属于极度贫困(杨宜勇等,201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快速下降:

2018 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27.7%，比 1978 年的 57.5%下降了 29.8 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30.1%，比 1978 年的 67.7%下降了 37.6 个百分点(见图 1)。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用于衡量健康、教育和收入水平,1990~2017 年,全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提升 22%；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由 0.502 上升到 0.752,提高了 49.8%（见图 1），世界排名升至第 86 位，由低人类发展指数国家跃升为高人类发展指数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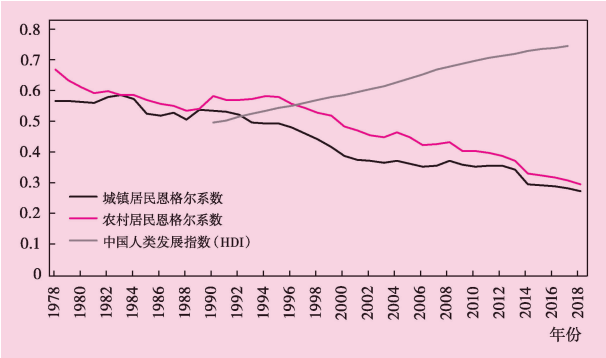


图 1 1978~2018 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 (HDI)、城镇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 二、70 年“7 个有所”的发展脉络

鉴于“7 个有所”作为整体基本覆盖了最重要的民生需求,本文按照“7 个有所”的基本框架分析新中国 70 年民生领域的发展变化。

### （一）幼有所育：减轻家庭抚养负担，推广科学育儿，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历届政府竭尽所能,努力让所有适龄儿童得到更好的养育。总体而言,70 年来,中国幼有所育取得了辉煌成就,目前全国学前 3 年毛入园率超过 80%,高于中高收入国家 69.2%的平均水平<sup>①</sup>。与其他 15 个发展中国家的学前教育发展状况相比,中国的入园率、公立幼儿园比例、学前教育投入和师幼比 4 项指标均处于中等水平(霍力岩、孙蕾蕾,2015)。

1949~1977 年,中国幼有所育事业经历了曲折探索过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幼有所育事业迅速建立,幼儿园数量 1950 年仅有 1 799 所,1956 年激增至 1.85 万所;幼儿园在园儿童数量由 1950 年的 14 万人激增至 1956 年的 108.1 万人;1952 年幼儿园专职教师只有 1 万人,1961 年增至 5 万人<sup>②</sup>。当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营企业是兴办幼儿园的主体。然而,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幼有所育发展受到重大挫折,幼儿园数量、幼儿园专职教师人数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1978~2011 年,学前教育主要指标呈“N”形走势,幼有所育事业经历了“迅速发展—断崖下跌—迅速恢复”的过程,但总体得到较快发展。1978~1999 年,幼儿园数量由 16.4

① 《教育部发布 2018 年全国教育事业基本情况》，教育部网站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902/t20190227\\_371408.html](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902/t20190227_371408.html))，2019 年 2 月 27 日。

② 本文未注明来源的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或根据此数据计算得到。

万所增至18.1万所,在园儿童由787.7万人增至2 326.3万人(见图2),全国专任教师由27.8万人增至87万人(见图3),适龄儿童净入园率也由1980年的93%提升至1999年的99.1%,学前教育实现平稳发展。此后,受市场化改革引发的社会对托育责任的剥离、家庭子女数量大幅降低(杨菊华,2019)、农村税费改革等因素影响,21世纪初城市和农村公办幼儿园数量出现急剧下滑,特别是2001年幼儿园数量比上年减少6.4万所,在园儿童数量减少了220万人以上(见图2),专任教师减少了30万人以上,学前教育事业发展出现了波折。但2004年学前教育各指标开始回升,2011年幼儿园数量达16.68万所,在园儿童数量3 424.5万人,专任教师132万人,超过了1999年的水平。1978~2011年,学前教育水平虽然整体在提高,但城乡差距越来越大。1987~2011年,乡村幼儿园专任教师数占全国幼儿园专任教师总数的比例由54.73%降至15.33%,下降近40个百分点;乡村幼儿园占比由72.5%降至35.19%,下降了近37个百分点;乡村学前教育在园人数占全国学前教育在园总人数的比重也由62.52%下降至29.02%,下降了近33个百分点,城乡学前教育差距持续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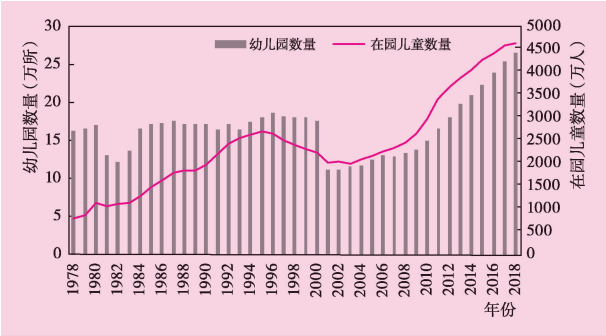


图2 1978~2018年中国幼儿园和在园儿童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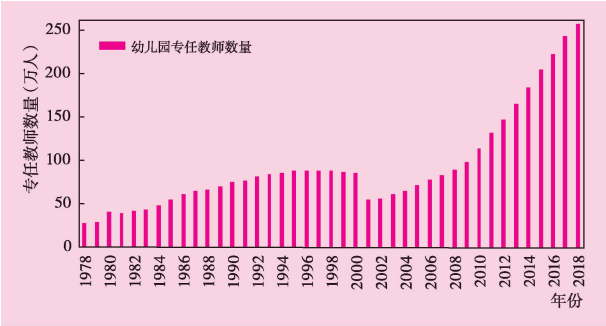


图3 1978~2018年中国幼儿园专任教师数量

2012~2019年,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幼有所育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幼有所育”,学前教育进入飞跃发展阶段,学前教育加快普及。幼儿园数量、在园儿童数、幼儿园专任教师数快速增加。截至2018年,幼儿园数量、在园儿童数、幼儿园专任教师数分别增至26.67万所、4 656万人、258万人,比2011年有较大幅度增长,学前教育呈快速发展态势。学前教育的城乡差距有所缓解,乡村幼儿园专任教师数占比、乡村幼儿园占比均有所上升,比2011年分别上升了1.3%、0.0018%,城乡差距拉大的势头有所遏制。此外,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sup>①</sup>要求

① 《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意见》,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7/201705/t20170502\\_303514.html](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7/201705/t20170502_303514.html)),2017年4月17日。



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 80% 左右,《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推进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展<sup>①</sup>,这将推动普惠性幼儿园快速发展,减轻家庭抚幼负担。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幼有所育事业成绩斐然,学前教育进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覆盖面大幅扩大,质量显著提高,普惠性学前教育飞跃发展,为儿童茁壮成长营造了良好环境。然而,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2012~2019 年学前教育的城乡差距虽然有所缩小,但整体差距依然较大。

## (二) 学有所教:发展优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教育事业实现长足发展,各级各类教育均取得显著成效,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整体上看,70 年的教育发展分为基本教育制度形成(1949~1977 年)、全面恢复和快速发展(1978~2011 年)与提质增效(2012~2019 年)3 个阶段。

1949~1977 年,中国形成了基本的教育制度,这一时期的各类教育均取得一定发展,教育普及程度得到较大提升。新中国成立伊始,就明确了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教育工作方针,毛泽东提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逐步扫除文盲,并保障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1949 年,中国小学、中等学校、普通高等教育学校在校生分别只有 2 439 万人、126.8 万人、11.7 万人,1957 年分别增加到 3 989 万人、705.9 万人、44.1 万人,分别增加了 1.6 倍、4.6 倍、2.8 倍。然而,1966~1976 年教育领域受到严重影响,学校遭遇停办,教学设备、图书资料甚至校舍与生活品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但整体而言,1949~1977 年,中国各级各类学校的数量和质量普遍提高,为以后人民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奠定了基础。

1978~2011 年,中国教育事业开始全面恢复,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各类教育均稳步发展。基础教育方面,这一阶段提出并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2009 年义务教育在校生达 1.5 亿人,巩固率达 90.8%。同时国家重视职业教育,职业中学在校学生数由 2004 年的 1 174.74 万人增加到 2011 年的 1 774.9 万人,职业中学数量由 1980 年的 3 314 所增至 2011 年的 4 856 所。高等教育也得到全面恢复和快速发展,2011 年普通高校在校人数 2 308.5 万人(见图 4),比 1978 年的 85.6 万人增加近 27 倍,普通高校数量由 1978 年的 598 所增至 2011 年的 2 442 所,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也由 1978 年的 24 万人增至 2011 年的 139 万人(见图 4),高等教育事业实现蓬勃发展。在各类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城乡和区域差距显现,并不断拉大。2003 年乡村初中在校生数占全国初中在校生数的比重为 48.02%,2011 年降至 22.95%;同时乡村初中阶段学校数占全国总数比重由 2004 年的 60.5% 下降到 2011 年的 38.8%(见图 5);乡村普通高中在校生数占全国普通

<sup>①</sup>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8-11/15/content\\_5340776.htm](http://www.gov.cn/xinwen/2018-11/15/content_5340776.htm)),2018 年 11 月 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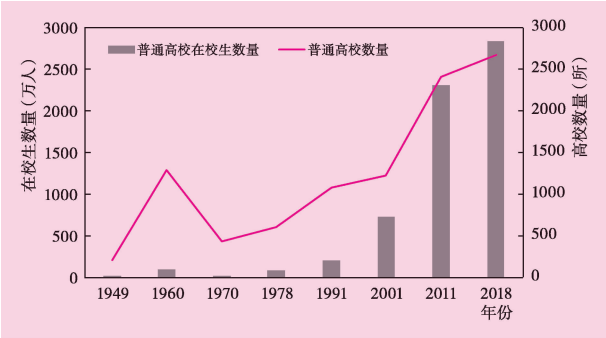


图4 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年份的普通高校数量和在校生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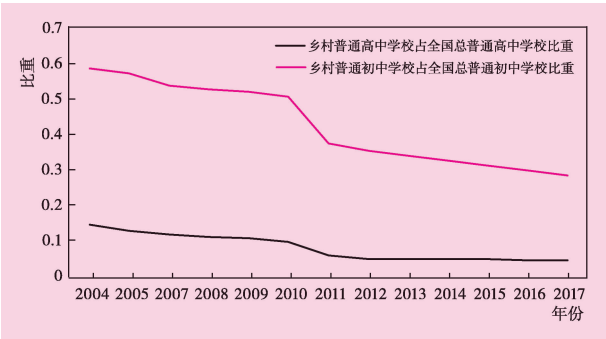


图5 2004~2017年中国乡村普通初、高中学校数占比

高中在校生数的比重由1987年的26.4%下降至2011年的4.2%，乡村普通高中学校数占比由2003年的14.5%下降到2011年的不足5%（见图5），下降幅度非常大。从反映办学条件的图书数量来看，2001年乡村小学图书量占全国小学图书总量的比重为60.5%，2011年下降至39.2%，下降了21.3个百分点。

2012~2019年，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迈上新台阶。义务教育方面，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均衡发展义务教育”的新理念，教育公平取得突破性进展，义务教育发展更加均衡，城乡教育差距拉大的势头有所遏制。2016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22.98万所，教育巩固率达93.4%，义务教育普及率超过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在全球9个发展中人口大国中率先实现全民教育

目标。与此同时，高等教育进入提质增效阶段，高等教育质量显著提升，普通高等学校数和在校人数持续增加，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数量为2663所，比2011年增加254所。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人数2831.03万人，比2011年增加552.53万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全面启动，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稳步增强，截至201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42.7%，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国家统计局，2019a）。

70年来，虽然中国教育事业中途遇到一些挫折，但总体而言取得巨大成就，教育公平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类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义务教育全面普及，职业教育加速发展，高等教育质量不断提升。学有所教不仅提高了全民族素质，而且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质人才，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显著提高。但学有所教仍存在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教育存在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校际差距、群体差距，教育不公平现象依然存在。

（三）劳有所得：努力实现充分就业，强化劳动能力建设，不断提高收入水平

就业是民生之本。新中国历届政府始终把就业问题摆在首位，在鼓励劳动者积极融入社会的同时，通过提高劳动收入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1949~1977年，一方面要安置大量新中国成立前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另一方面要

大力振兴经济,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适应,通过政府的劳动力计划配置城乡就业,较好地解决了当时的就业问题。1949 年全国就业人员只有 1.8 亿人,1978 年发展到 4.02 亿人(国家统计局,2019c)。这一时期公有制经济中就业比重明显上升,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就业比重显著下降;农村就业比重下降,城镇就业比重上升。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数比重由 1949 年的 8.5% 上升到 1978 年的 23.7%。1952 年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分别为 83.5%、7.4% 和 9.1%,1978 年变为 70.5%、17.3% 和 12.2%。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1949 年的 0.9 年提高到 1978 年的 4.6 年(国家统计局,2019c)。这一时期,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收入构成几乎全部是劳动报酬,收入分配差距小。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49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 47.8 元,1956 年为 98 元,1978 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 171 元<sup>①</sup>。

1978~2011 年,政府一方面要消化大量知识青年集中返城的二次就业问题,另一方面要消除计划经济带来的劳动力配置僵化问题,同时通过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和职工下岗分流,进一步激发就业活力和工作动力。这一时期就业发展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密结合,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就业结构中第二、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非公经济的就业比重和高素质劳动力的比重均不断上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1978 年的 4.6 年提高到 2011 年 7.6 年(国家统计局,2012)。全国就业人员由 1978 年的 4.02 亿人增加到 2011 年的 7.64 亿人。其中,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国有企业用工多元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截至 2011 年农民工总量为 25 278 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 9 415 万人,外出农民工 15 863 万人(国家统计局,2012)。与改革开放同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国营经济实行利改税、分配包干,大大刺激了小集体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积极性,工资性收入和居民收入进入快速增长通道。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78 年的 171 元增加到 2011 年的 11 992 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 1978 年的 134 元上升到 2011 年的 6 977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 1978 年的 343 元上升到 2011 年的 21 810 元,人民群众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实惠(国家统计局,2012)。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1978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2.56:1,由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遍推行,1983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 1.82:1;随着 1984 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扩大,2011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扩大到 3.13:1(见图 6)。

2012~2019 年,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把积极的就业政策上升为宏观政策,积极应对

<sup>①</sup> 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22.8 倍》,中国经济网(<https://finance.sina.cn/2018-08-27/detail-ihixzkml568275.d.html>),2018 年 8 月 27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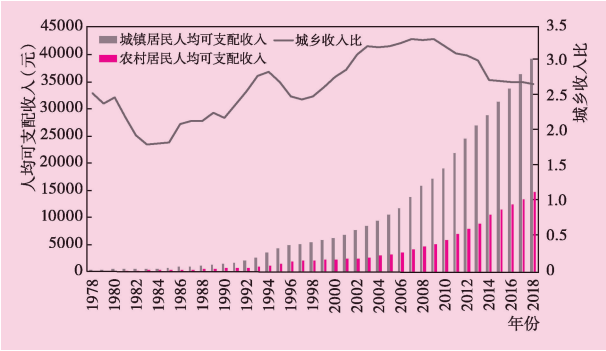


图6 1978~2018年中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外部冲击,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加大改善营商环境,鼓励创新创业行为;另一方面弘扬工匠精神,加大职业培训力度。全国就业人员由2011年的7.64亿人增加到2018年的7.76亿人,由于新生劳动力减少,这个时期就业总量比较稳定,劳动力素质快速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11年的7.6年提高到2017

年的10.5年(李克强,2018),初步估计到2019年年底为10.7年<sup>①</sup>。受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的影响,劳动力供给总量下降,并且2018年全国就业人员总量首次出现下降,预计今后几年还将继续下降。农民工总量由2011年的25278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28836万人,其中本地农民工11570万人,外出农民工17266万人。这个时期特别强调提高生产率,全员人均劳动生产率由2011年的61707元上升为2018年的107327元(国家统计局,2012)。在此期间,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2013年实施新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收入分配关系进一步理顺,按劳分配不断完善,按要素分配更加合理,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这个时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1年的11992元增加到2018年的28228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1年的21810元上升到2018年的3925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1年的6977元上升到2018年的14617元(见图6)。与此同时,由于中央加大“三农”财政投入,并建立健全种粮农民补贴制度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2018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9:1,相对2011年的3.13:1有明显的缩小<sup>②</sup>。

(四) 病有所医:增加医疗卫生供给,努力建设健康中国,全面提高预期寿命

新中国70年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对美好生活的支持和保障作用,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改善,人均预期寿命由35岁提高到77岁,婴儿死亡率由200‰下降到6.1‰,孕产妇死亡率由1500/10万下降到18.3/10万,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sup>③</sup>。

1949~1977年,中国初步搭建起医疗卫生网络,在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发达的阶段,以较低的医疗卫生投入,保障了人民群众基本健康所需和传染病等重大卫生风险防范。医疗卫生网络方面,从1965年开始,中国加快建立包括村卫生室、公社医务所和县医院

① 根据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变化规律进行的初步预测。  
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计算。  
③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429816/430134/430299/index.html?from=groupmessage>),2019年9月26日。



在内的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1949 年,全国仅有医疗卫生机构 3 670 家,主要为教会医院、军队医院和防疫所,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只有 8.5 万张(见图 7),每万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只有 7 人(见图 8),服务提供能力非常有限。1959 年医疗卫生机构增至 231 958 家,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增至 81 万张,医疗服务能力大大提高,建立起适应当时国情的卫生服务提供机制。医疗保障方面,城市职工及其家属根据所服务单位性质不同,分别参加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农村由合作医疗筹资并提供初级卫生服务。

1978~2011 年,中国医疗卫生供给能力大幅增长,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医疗卫生投入不断增加。供给能力方面,1978~2011 年,医疗卫生机构数由 169 732 个增加至 954 389 个,卫生技术人员由 788.30 万人增加至 861.60 万人,每万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由 11 人增至 18 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由 204.2 万张增加至 516 万张,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也由 2002 年的 24.9 张增至 38.4 张,医疗卫生服务供给能力不断增强。医疗卫生投入方面,1978 年卫生总费用占 GDP 的比重为 3.02%,2011 年增加到 5.03%(见图 9)。医疗卫生筹资来源出现调整,1978~2001 年,个人卫生支出比重持续增加(见图 9),由 20.4% 增加至 60%;社会卫生支出比重由 47.4% 降至 24.1%,政府卫生支出比重由 32.2% 降至 15.9%;个人医疗负担增加,“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较为突出,严重影响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公益性。针对这个问题,政府开始进行调整,政府责任逐步回归,提出医疗、医药和医保“三医联动”的医疗架构,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下降,社会卫生支出和政府卫生支出比重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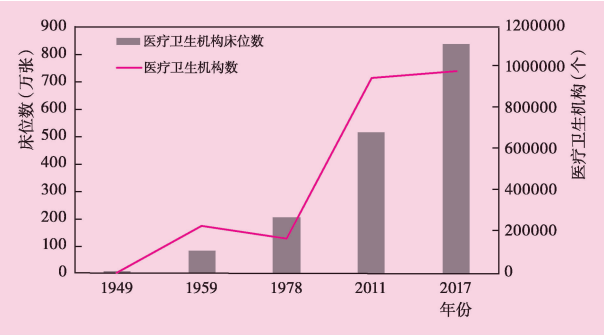


图 7 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年份医疗卫生机构和床位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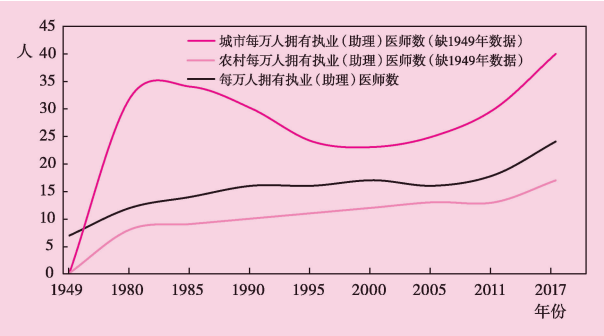


图 8 新中国成立以来主要年份每万人执业(助理)医师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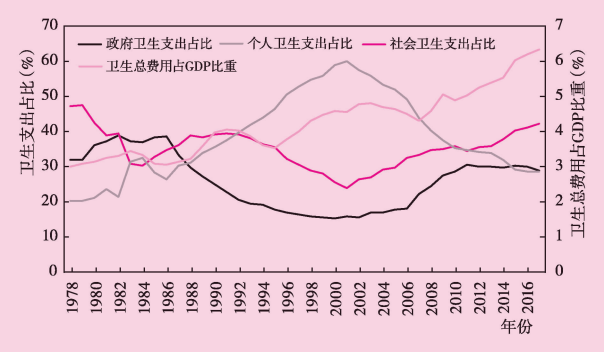


图 9 1978~2017 年政府、社会及个人卫生支出情况



2011年分别为34.8%、34.5%、30.7%。医疗卫生事业虽然取得了较大成就,但城乡之间存在差距,且不断扩大,如农村每万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一直少于城市,2000年比城市少11人,到2011年进一步扩大到比城市少17人。

2012~2019年,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医疗卫生供给能力和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政府卫生投入责任得到落实,居民看病负担继续降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结构更加完善。医疗卫生网络不断健全,服务的可及性显著提高,国家建立了覆盖城市(省、市、镇)、农村(县、乡、村)的医疗预防保健三级网,全民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健成为可能<sup>①</sup>。医疗卫生资源有效供给水平全面提升,2017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床位840.40万张,比2011年增长了62.9%;每万人拥有执业(助理)医师数增至24人,比2011年增加33.33%,医疗卫生机构数986 649个,比2011年增加32 000多个(见图7、图8)。2018年,全国门急诊总量超过83亿人次,出院量超过2.5亿人次。卫生投入也不断增加,2018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达6.6%(见图9)。政府、社会和个人在卫生支出的结构优化,2017年占比分别为28.91%、42.32%、28.77%,政府责任进一步夯实,居民看病就医的负担逐渐减轻。此外,中国政府大力推进新型医疗改革,整合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面建立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破除以药养医,推进医药分开,取消药品加成,2016年年底,公立医院药品收入占比已由2009年的46%下降到40%。

#### (五) 老有所养:系统应对老龄化,实现养老保险全覆盖,稳步提高养老服务质量

1949~1977年,养老机构的床位十分稀少且主要集中在大城市。1978年养老机构及其床位还没有专门的统计项目,1978年全国收养机构(包括养老机构)仅有8 365个(民政部,2014)。在整个计划经济时期,老有所养不是主张由社会提供,而是提倡由所在工作单位提供。具体而言,机关事业单位负责本单位老干部的养老,当时的国营企业单位负责本单位退休职工的养老,人民公社负责本公社社员的养老。这个时期的老有所养水平较低,但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一致。

1978~2011年,老有所养有三大转变:一是从为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和职工提供退休金扩大到为各类企业职工和城乡居民建立养老保险,基本上实现了全员覆盖;二是基本养老保险从原先以国家和集体作为投资主体向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分担转变,保险资金更加充足;三是老年福利从仅面对城市“三无”老人和农村“五保”老人转向面对社会特定年龄段以上的所有老人。这个时期,不仅完成了老有所养的顶层设计,而且进展最突出的是完善基本养老保险体系,确保个人老有所养有稳定的现金流。1978年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还没有开始,20世纪

<sup>①</sup>《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429816/430134/430299/index.html?from=groupmessage>),2019年9月26日。

80 年代中期开始试点探索,1992 年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面扩大并首次公布相关数据,当时全国有 50 多万户企业、8 500 多万职工和 1 700 多万离退休人员参加退休费用社会统筹,为实现劳动力的全社会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劳动部、国家统计局,1993)。到 2011 年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成效显著,当年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员达 28 391 万人,其中参保职工 21 565 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 6 826 万人。参加国家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人员 32 643 万人,其中实际领取待遇人员 8 525 万人,参加国家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员 539 万人,其中实际领取待遇人员 235 万人,2011 年年末全国有 4.49 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参加职工 1 577 万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2)。

2012~2019 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一方面,有关部门将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并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适当发展职业年金;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养老服务机构,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养老服务需求。由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相关部门完成了养老服务的顶层设计,即建立了由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构成的三位一体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截至 2018 年年底,全国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增加到 16.8 万个,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 29.1 张,养老机构床位数从 2013 年的 493.7 万张增加到 2018 年的 721.1 万张。其中,注册登记的养老机构 2.9 万个,床位 379.4 万张;社区养老照料机构和设施 4.5 万个,社区互助型养老设施 9.1 万个,社区留宿和日间照料床位达 347.8 万张(民政部,2019)。但是,要实现原定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 35 张的阶段性目标,还需继续努力。这一时期,老年人福利也稳步发展。2011 年年底,全国共有老龄事业单位 2 503 个,老年法律援助中心 19 407 个,老年维权协调组织 8.4 万个,老年学校 48 116 个,在校学习人员 603.2 万人,各类老年活动室 41.3 万个(民政部,2012)。截至 2018 年年底,享受护理补贴的老年人 74.8 万人,比上年增长 22.0%;享受养老服务补贴的老年人 521.7 万人,比上年增长 47.2%;享受其他老龄补贴的老年人 3.0 万人(民政部,2019)。与此同时,国家陆续出台养老服务业的基础性标准。2017 年 12 月 29 日国家标准委发布了《养老机构服务质量基本规范》,明确了全国养老机构服务质量的基准线。2019 年 2 月 18 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国家标准化委员会又联合发布了《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这个标准把养老机构分为 5 个等级,养老机构等级越高,服务内容越丰富,设施设备和环境越完善,管理制度越规范,人才队伍越健全,服务质量越高。

#### (六) 住有所居:多渠道供应,多层次保障,不断改善住房条件和居住质量

住房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要素。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基本解决了城乡居民住房问题,人民群众住房条件显著改善。

1949~1977 年,实行计划经济时代的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政府或国有企业直接投资建设或更新改造住房,分配给城镇居民租住,住房租金低,具有明显的福利保障特征。由于住房建设资金只有投入没有回报,住房的投融资机制被严重扭曲,住房投资长

期匮乏,因此住房存量不足且居住条件差,城镇居民的居住水平难以得到根本改善。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从1956年的5.7平方米微增到6.7平方米(国家统计局,2019b)。存量房中还存在大量危房和棚户区,住房质量得不到保障。

1978~2011年是中国住房市场化改革全面铺开阶段。199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住房分配由实物福利向货币化转型,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持续的住宅建设新高潮,推动了以住宅为主的房地产市场不断发展,对拉动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房地产相关行业关联度高,带动力强,由此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同时,中国不断探索保障房的多种形式,初步构建了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为主的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图10显示,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从1978年的6.7平方米快速上升到2011年的32.7平方米,增加了3.88倍。但房价快速上涨导致城市居民的住房可支付能力下降,全国房价收入比从1998年的6.21上升到2011年的7.49。同时,中国不同类型的城市房价呈现出结构化差异(黄燕芬、肖翔,2014),城市“夹心层”及包含农民工在内的新市民住房问题凸显(吕萍等,2012),住房保障依然面临严峻挑战。

2012~2019年,中国政府注重住房制度长效机制建设,一方面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另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保障性住房供应体系。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各级政府认真贯彻“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的理念,聚焦城市“夹心层”及新市民,从土地、金融和税收等多方面入手,完善多元化的住房保障体系,全面拓宽住房保障范围和渠道;同时努力抓好房地产调控,支持居民自住购房需求,抑制投资投机性购房,加强住房市场监管和整顿,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严格管控商品房价格,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这一时期还注重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以“租购同权”促“租售并举”,推动住房租赁市场立法,促进机构化、规模化租赁企业发展,从而加快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律的制度和长效机制。这一时期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有效抑制,全国房价收入比基本趋稳,公租房、共有产权房、限价房、棚户区改造、“租购同权”等举措为“夹心层”及新市民提供了更多、更广的居住空间。

整体上看,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住有所居呈现以下特征:(1)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不断增加,居民住房条件大大改善。图10显示,2018年中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39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32.3平方米。同时,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47.3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39.2平方米(国家统计局,2019b)。(2)基本建立起能够全覆盖、满足人们不同需求层级的多渠道供应、多层次保障的住房体系。改革开放后,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廉租房、公租房、共有产权房等保障性住房类型,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住房保障体系。70年来,中国累计建设各

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 8 000 多万套,帮助 2 亿多群众解决了住房困难<sup>①</sup>。(3) 住房保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首先,保障性住房供给整体呈现大城市供不应求而中小城市供过于求。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由于保障性住房建设规模滞后于人口流入规模,供需矛盾尖锐,保障性住房供不应求的现象普遍存在。相反中小城市由于人口外流较多,保障性住房实际需求相对较小,往往供过于求。其次,保障性住房空间分布不平衡进而导致受保障群体职住分离现象严重。各类保障性住房如公租房、廉租房等选址远离产业集中的城市中心,因交通基础设施条件差、通勤成本过高、公共服务配套不足而导致入住率不高(黄燕芬等,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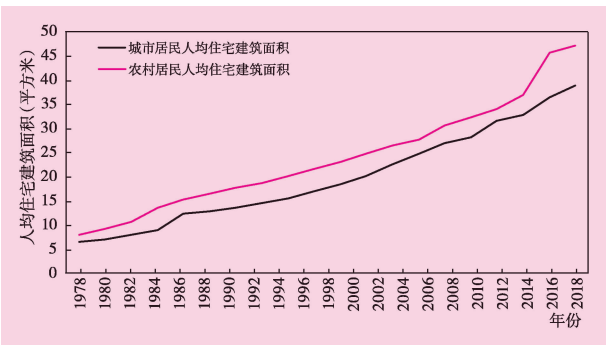


图 10 1978~2018 年中国城市及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情况

注:1978~2017 年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2018 年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19b。

(七) 弱有所扶:因人施策,大力发展各种福利,确保边缘人群的体面生活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对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体进行帮扶,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提出“弱有所扶”后,更加高度重视发展弱有所扶事业,更加关注和保障全体国民的生存权、发展权。

1949~1977 年,中国民政福利框架基本形成,主要为无依无靠的城镇孤寡老人、孤儿和残疾人等提供救助。民政福利包括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福利企业。社会福利事业是指各种福利院、精神病院等收养性机构,截至 1953 年年底,全国共有城市福利救济事业单位 920 个,先后收容的孤老、孤儿、精神病人及其他人员 37.4 万人(宋士云,2009)。社会福利企业是指通过建立福利企业吸收残疾人就业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生活保障问题,1956 年以后,福利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在农村,中国建立起“保吃、保穿、保烧、保教和保葬”的“五保”供养制度,1958 年全国享受“五保”的有 413 万户、519 万人(宋士云,2009)。与此同时,一些全国性的民间社会福利团体逐渐建立起来,如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中国福利会、中国盲人福利会和中国聋哑人福利会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1978~2011 年,由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扶贫事业的重心和方式也随之调整,呈现出阶段性特征。1978~1985 年,国家主要通过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方式推动减贫,通过建立和推广家庭承包经营制极大地解放和

① 《住建部:我国建成了世界最大住房保障体系》([https://house.ifeng.com/news/2019\\_09\\_28-52339251\\_0.shtml](https://house.ifeng.com/news/2019_09_28-52339251_0.shtml)),2019 年 9 月 28 日。



发展农村生产力,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下降到1.25亿左右,贫困发生率由30.7%下降到14.8%(国家统计局,2005)。1986~1993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村发展的区域差距显现,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老、少、边、穷”地区,在这一时期国家通过区域开发方式进行扶贫,但实践中这种方式没有让贫困农户直接受益,因此,贫困人口下降的速度有所减缓。1994~2000年,中国扶贫事业进入综合性扶贫攻坚阶段,1994年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通知》<sup>①</sup>,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要求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以贫困村和贫困户为基本单位和工作对象,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2000年目标如期实现。2001~2012年,中国扶贫事业进入整村推进与“两轮驱动”扶贫阶段,确定了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和15万个贫困村,全面进行以整村推进、产业发展、劳动力转移为重点的扶贫开发,2010年,在国家贫困线下的贫困人口减少到2688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8%(叶晓楠,2012)。2012~2019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扶贫工作,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要求甄别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具体状况,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这使扶贫工作更有针对性,更加高效。这一阶段,扶贫工作成就显著,2013~2018年,中国贫困人口由8249万减少到1660万;贫困发生率由2013年的8.5%下降到2018年的1.7%;国家级贫困县的数量由2013年的592个下降到2018年的305个,减少了287个,其中2018年减少约280个<sup>②</sup>。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救助覆盖面不断扩大,救助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城乡低保、“五保”供养、流浪人员救助及包含医疗、就业、住房、教育等领域的新型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社会救助制度不断朝着体系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1978~2011年,中国对社会救助制度进行了探索和体系化建设。1978~1999年,中国救助制度建设进入探索阶段。农村方面,继续完善农村“五保”供养救助,1978~1996年农村集体用于“五保”供养和贫困户补助的资金总计达200多亿元。城市方面,建立并推广城市低保制度,1999年9月底,全国667个城市、1638个县政府所在地全部建立了城市低保制度(柳旭等,2019),城市享受社会救济的对象从1979年的24万人增加到1999年的542.2万人,每年人均救济金从1979年的75元增长到1999年的528元。2000~2011年,中国社会救助事业进入体系化发展阶段,在不断完善城乡低保制度的基础上,新型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廉租住房救助制度、城乡医疗救助制度、教育救助制度和临时救助制度等社会救助制度得

① 《关于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通知》([http://www.gov.cn/jztzl/fupin/content\\_396733.htm](http://www.gov.cn/jztzl/fupin/content_396733.htm)),2006年9月23日。

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取得重大决定性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9-02/20/content\\_5367135.htm](http://www.gov.cn/xinwen/2019-02/20/content_5367135.htm)),2019年2月20日。



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开发阶段和成就

阶 段	主要举措	扶贫成就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减贫阶段 (1978~1985 年)	建立和推广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 2.5 亿下降到 1.25 亿左右
区域开发式扶贫阶段 (1986~1993 年)	以“老、少、边、穷”为对象,以区域开 发带动扶贫	贫困人口下降的速度有所减缓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1994~2000 年)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全国范围内 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 扶贫工作,实现了从救济式扶贫向 开发式扶贫的转变	用 7 年时间基本解决了 8 000 万贫 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使全国绝大多 数贫困户年人均纯收入按 1990 年 不变价格计算达到 500 元以上
整村推进与“两轮驱动”扶贫 阶段(2001~2012 年)	全面进行整村推进、产业发展、劳动 力转移为重点的扶贫开发	在国家贫困线下的贫困人口减少到 2 688 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2.8%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阶段 (2013~2019 年)	甄别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 等状况,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	2018 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到 1 660 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1.7%,国家 级贫困县的数量下降到 305 个

到较好发展,为困难群众织出了一张能够保障其基本生活的社会安全网。2012~2019 年,中国的社会救助事业进入制度化规范化发展阶段,社会救助事业发展被纳入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的总体部署中,2014 年 2 月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是中国首部统筹各项社会救助制度的行政法规,为中国社会救助事业制度化规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救助运行机制不断健全,管理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救助的长效机制逐步建立健全。2014~2018 年,受基本实现“应保尽保”、再就业联动工作机制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享受城乡低保的人数明显下降(见图 11)。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推动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残疾人事业不断取得新成就,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残疾人群体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概括而言,1978~2011 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先恢复后快速发展。1978~1987 年,中国残疾人事业进入恢复发展阶段,一方面,残疾人组织实现恢复和发展,如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恢复工作及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成立。另一方面,残疾人事业仍然以收养救济为主,主要通过福利院等救助机构解决残疾人基本生存需求。1988~2007 年,中国残疾人事业持续快速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1) 残疾人事业走上法制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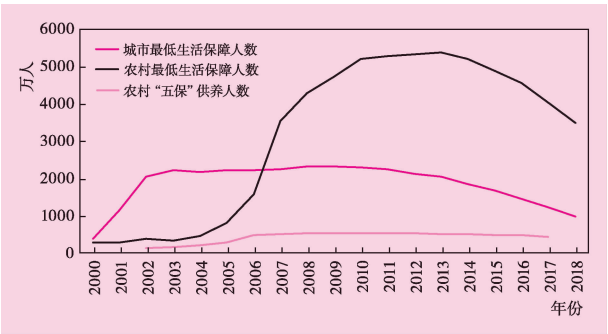


图 11 2000~2018 年中国城市、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及农村“五保”供养人数

发展轨道,1991年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2)残疾人事业被纳入国家发展规划,更加注重残疾人康复、教育、文化体育、就业、扶贫、社会保障、无障碍环境方面的建设;(3)残疾人事业走上组织化发展道路,1988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2012~2019年,党和政府进一步推动残疾事业全面发展,密集出台推动残疾人事业全面深入发展的政策,如残疾人事业“十三五”规划等。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将“普惠+特惠”确定为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基本原则,强调既要通过普惠性制度安排给予残疾人公平待遇,又要通过特惠性制度安排给予残疾人特殊扶助和优先保障<sup>①</sup>。2012~2017年,中国残疾人康复机构从4 595个增加到8 834个;每年普通高等院校录取残疾学生从2 166名增长到10 818名,残疾人事业成果显著。

### 三、结 语

通过分析“7个有所”在过去70年的演进历史,本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1)“7个有所”的发展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保吃穿到保教育和医疗,再从“5个有所”发展到“7个有所”,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体现了中国政府重要的使命担当。(2)“7个有所”之间参差不齐,发展不平衡。“7个有所”是一个整体,但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是同力度推进,而是遵循先重大后一般、先简单后复杂、先低水平后高质量的发展路径。这基本上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也造成了“7个有所”之间参差不齐,发展不平衡的局面。(3)70年民生大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得到强化。“7个有所”的民生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高度相关,是服务型政府的民生责任,政府财政投入需要协调好经济建设投资和民生发展投入的比例关系。同时在民生发展中要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并适当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4)资金来源多渠道,投资主体多元化,是促进70年民生建设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力。未来要进一步强化筹资机制的建设和完善,确保民生发展的各种资金源源不断,拓展多主体供给,完善多渠道保障。

#### 参考文献:

1.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2. 国家统计局(2005):《中国统计摘要》,中国统计出版社。
3. 国家统计局(2012):《中华人民共和国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qgndtjgb/201202/t20120222\\_30026.htm](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qgndtjgb/201202/t20120222_30026.htm)),2月22日。

---

<sup>①</sup>《关于加快推进残疾人小康进程的意见》,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会网站([http://www.cdprf.org.cn/ztzl/special/CDRS/szkd/201603/t20160330\\_546576.html](http://www.cdprf.org.cn/ztzl/special/CDRS/szkd/201603/t20160330_546576.html)),2015年1月20日。

4. 国家统计局(2019a):《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2018)》,中国统计出版社。
5. 国家统计局(2019b):《建筑业持续快速发展 城乡面貌显著改善——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31\\_1683002.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907/t20190731_1683002.html)),7 月 31 日。
6. 国家统计局(2019c):《就业规模不断扩大就业形势长期稳定——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九》([http://www.gov.cn/xinwen/2019-08/20/content\\_5422616.htm](http://www.gov.cn/xinwen/2019-08/20/content_5422616.htm)),8 月 20 日。
7. 习近平(20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8. 习近平(2017a):《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9. 习近平(2017b):《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单行本),人民出版社。
10. 霍力岩、孙蕾蕾(2015):《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学前教育发展的比较研究》,《现代教育论丛》,第 3 期。
11. 胡锦涛(2016):《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2. 黄燕芬、肖翔(2014):《中国式分权视角下城市行政层级对房价的影响机理》,《教学与研究》,第 9 期。
13. 黄燕芬等(2018):《住房保障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表现、成因与对策》,《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 6 期。
14. 江泽民(2006):《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15. 劳动部、国家统计局(1993):《关于 1992 年劳动事业发展的公报》,《中国劳动科学》,第 7 期。
16. 李克强(2018):《政府工作报告——2018 年 3 月 5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03/22/content\\_5276608.htm](http://www.gov.cn/guowuyuan/2018-03/22/content_5276608.htm)),3 月 22 日。
17. 吕萍等(2012):《差异化农民工住房政策的构建设想》,《经济地理》,第 10 期。
18. 柳旭等(2019):《低保,建在人民心中的伟大工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http://www.mca.gov.cn/article/xw/mtbd/201909/20190900019819.shtml>),9 月 23 日。
19. 毛泽东(199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20. 民政部(2012):《2011 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h/201210/201210153625989.shtml>),6 月 21 日。
21. 民政部(2014):《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13)》,中国社会出版社。
22. 民政部(2019):《2018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h/201908/20190800018807.shtml>),8 月 15 日。
23.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2):《2011 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szrs/tjgh/201206/t20120605\\_69908.html](http://www.mohrss.gov.cn/SYrlzyhshbzb/zwgk/szrs/tjgh/201206/t20120605_69908.html)),6 月 5 日。
24. 宋士云(2009):《新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3 期。
25. 杨宜勇等(2019):《新中国民生发展 70 年》,人民出版社。
26. 杨菊华(2019):《新时代“幼有所育”何以实现》,《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 1 期。
27. 叶晓楠(2012):《我国贫困人口从 9 422 万减到 2 688 万》,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18057381.html>),6 月 2 日。

(责任编辑:朱 犁)